

明清徽州 方氏宗族个案研究

MINGQING HUIZHOU FANGSHI ZONGZU GEAN YANJIU

探讨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扩大原因以及其现代意义。

朴元熇/著

海外徽学研究译丛

明清徽州方氏宗族个案研究

Mingqing Huizhou Fangshi Zongzu Gean Yanjiu

朴元熇/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 山 书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徽州方氏宗族个案研究 / 朴元熇著. —合肥：
黄山书社,2013.11

ISBN 978 - 7 - 5461 - 3964 - 7

I . ①明… II . ①朴… III . ①宗族 - 研究 - 歙县 - 明清时代
IV . ①K82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2504 号

明清徽州方氏宗族个案研究

朴元熇 著

出版人 任耕耘

责任编辑 韩开元

装帧设计 熙宇文化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
官方直营书店(<http://www.hsbook.taobao.com>)
营销部电话:0551 - 63533762 63533768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23007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合肥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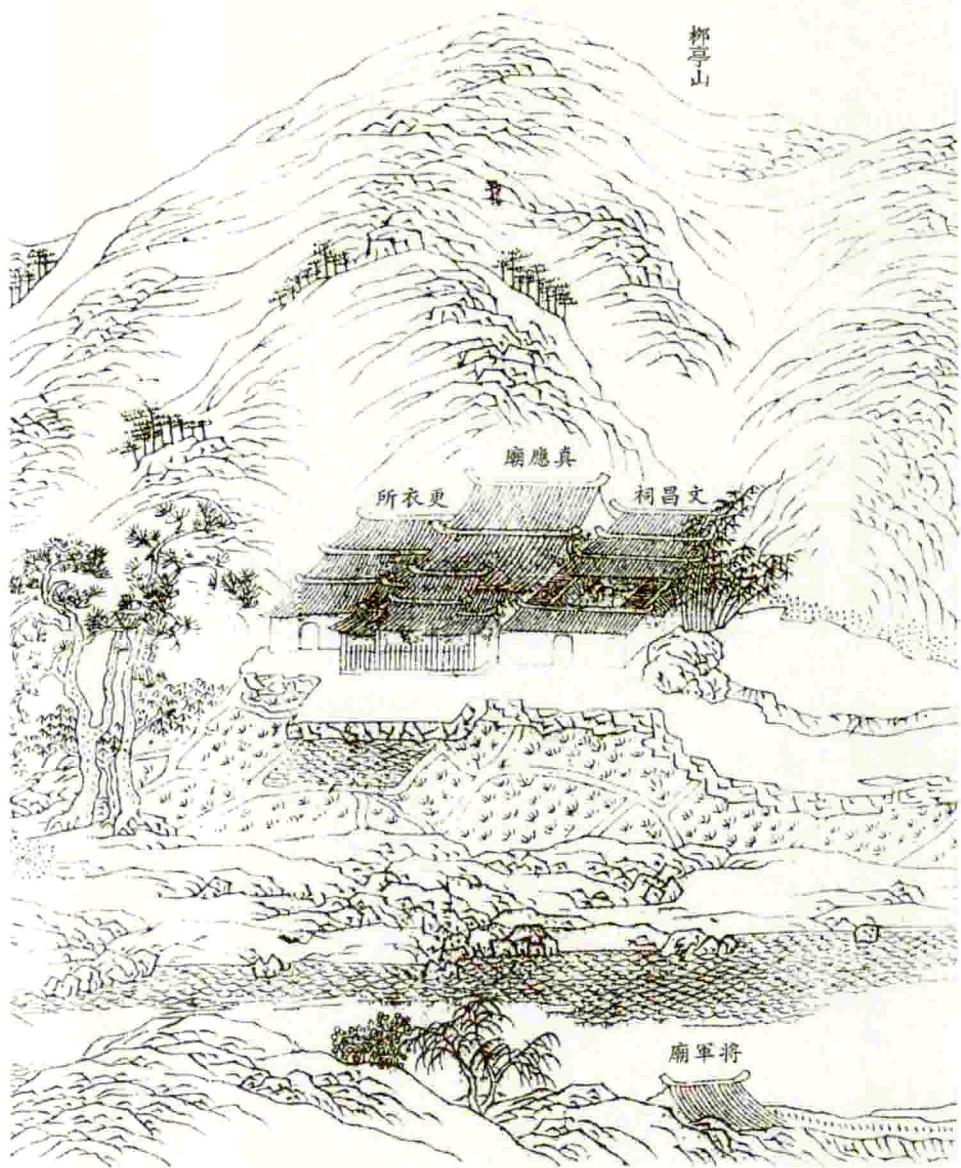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9.25 彩插 8 页 字数 400 千

版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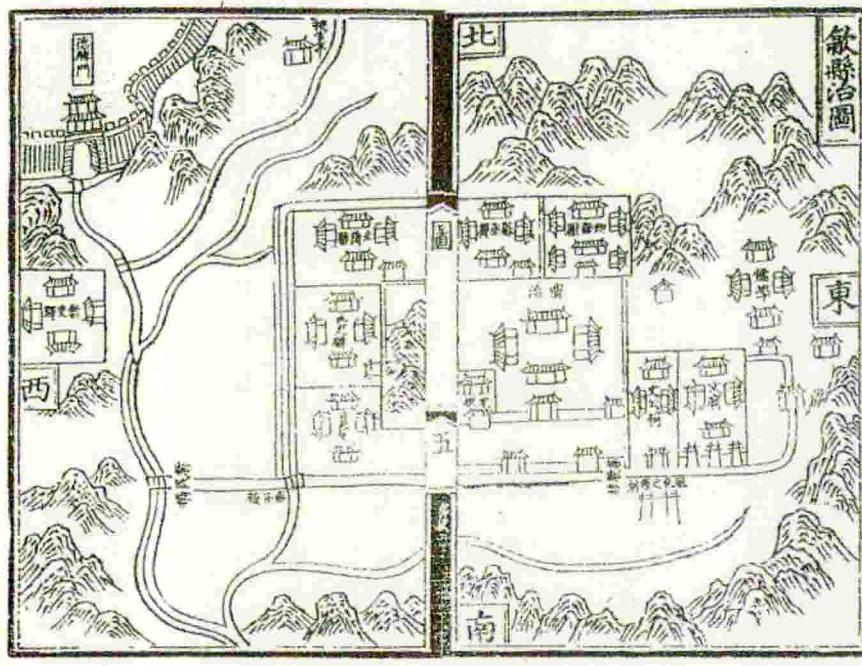
书号 978 - 7 - 5461 - 3964 - 7 定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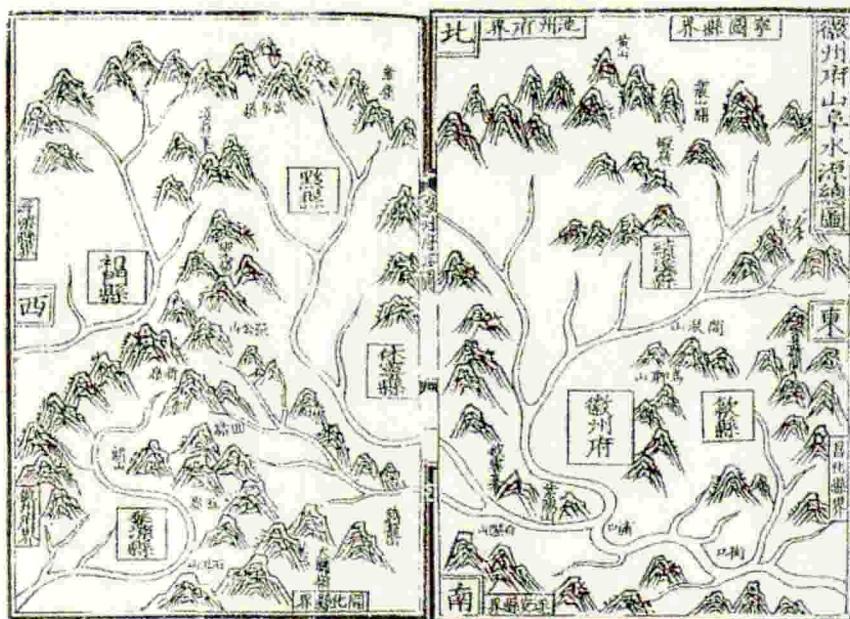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与黄山书社印制科联系调换 电话:0551 - 63533725)



柳亭山图 乾隆《方氏会宗统谱》卷 18



歙县治图 弘治《徽州府志》



徽州府图 弘治《徽州府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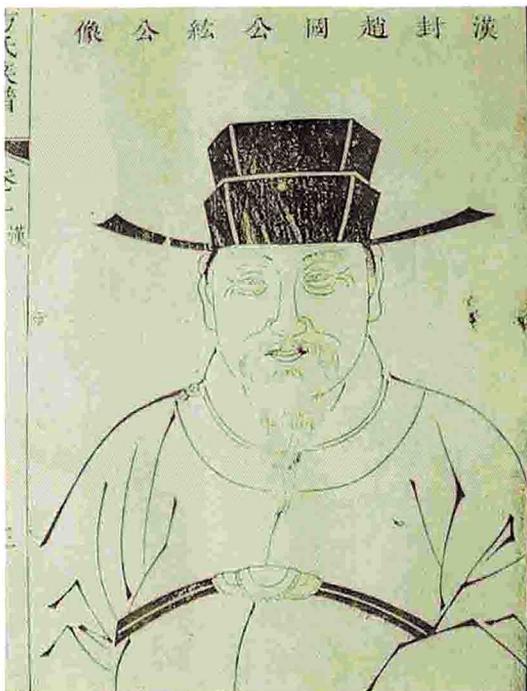
朱子鄉林朱子之道天下後世所仰賴而師法者先生之教亦率是而已門人在是子孫亦在是聲音笑貌志童樂嗜皆可以見其精神血氣之感通昭明君萬之發見當必有既乎心者猶先生之教以上濟木子而脩己治人之道省馴至其極可謂善學者矣
此固先生之志而後人之所當務也
程都憲司在古祀右副都御史程富大理少卿弋陽李奎記畧曰自光武立亂下爲
以武定亂所爲
新安程都憲公則其一人焉
之裴晉公文武兼備爲中興良弼徵之燕民之雅淮西之碑可見也
我聖明受命龍興光徽氣合全才豪征其兄諸施設以文輔治
以武定亂爲
國家所倚重下爲子孫所祀者若
國家所倚重下爲子孫所祀者若
則其一人焉
令君廟在城西十五里望寧今遷
諫議司在縣北孝悌里注川以相宋議大夫謝
祕其遠孫宗貴福政九遐傑德洪厚等建介菴先
生祠授徒行其跡陶者舉相與立祠祀之
徽州府志卷五
三十九
廟在縣陳村山土以相唐華氏二女神虎叔母者
孝女廟在城陽山下不方諸
廟一名懸侯廟亦名仙翁廟在縣南柳亭亭宇小山上宋賜號真應廟
龍王廟舊在溪山移之山下張許二侯雙廟在縣西十五都潛川以祀唐
裕之山下張許二侯雙廟張許達新安去睢陽遠矣
不想有廟然史臣贊二公謂以破辛數萬叟孤孀抗方
張不制之旁睡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有星大小莫
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淮財用以
補中興故江淮多祀之此廟所以立也
張許同死睢陽而史失其名政和乾道加封至八字
余得請于上帝命爲徽府司錄事參軍
王廟在縣北十里張氏第下家於灘之白馬安史之亂與
王廟所祭王姓氏第下家於灘之白馬安史之亂與
張許同死睢陽而史失其名政和乾道加封至八字
余得請于上帝命爲徽府司錄事參軍
善惡而賞罰之以故徽祠皆設王像云
李惠廟在城外本出信州相傳謂神爲石敬純乃東晉時前趙之
王惠爲鳴冤故信人祠之宋時封至八字王

方储庵 弘治《徽州府志》卷五



歙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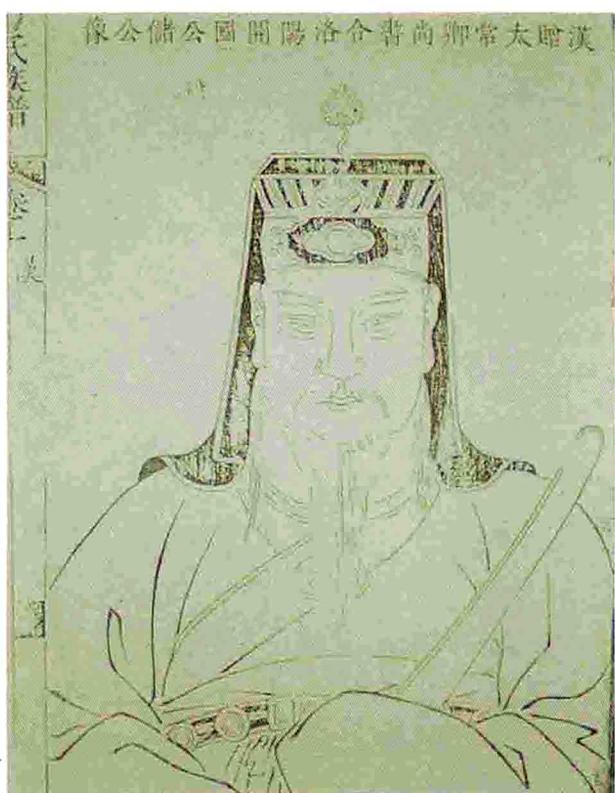
漢封趙國公紘公像



方紘像

康熙《歙县环岩派方氏族谱》卷一

漢贈太常卿尚書常陽洛合公儲公像



方儲像

康熙《歙县环岩派方氏族谱》卷一



作者在歙县柳亭山真应庙址前



淳安县光昌乡富山村方氏家庙之悬板



淳安县方氏家庙的《重修方仙翁新祠记》



淳安县光昌乡富山村方氏家庙的方储像

出版说明

徽州是传统中国的缩影，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海外学术界对徽州的历史文化有着比较浓厚的学术兴趣，已经展开了一系列专门研究。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海外在与徽州有关的商人、宗族、儒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蔚为大观，以日本、韩国、英语国家及港台地区学者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这种研究拓宽了中国学研究领域，深化了对传统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识。但是，这些成果绝大部分没有在国内翻译出版，因此，将海外徽学研究成果翻译介绍到国内，已经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繁荣发展中国文化的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已经成为海内外徽学研究的重要平台，为了凝聚海内外徽学研究队伍，深化徽学研究内涵，促进徽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徽学研究中心设立教育部基地重大招标项目《海外徽学研究译丛及研究》（项目号：13JJD770001），作为项目成果，准备出版《海外徽学研究译丛》。这套丛书将涵盖英、日、韩文的主要徽学研究成果。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海外徽学研究成果的翻译介绍与研究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海外徽学研究译丛》的出版只是一个开始。将优秀徽学研究成果引进来，这只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要

2 出版说明

将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徽州文化介绍到海外，扩大中国文化
的影响力，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

序 文

我开始从事中国历史研究时，还处于严酷的东西冷战之格局下，所以很长时间内，韩国学者并不能前往中国大陆，而只能去台湾或香港体验中国文化而从事中国历史研究。1989年，我经由香港，终于首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我访问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当时担任系主任的马克尧教授、成汉昌教授见了面。经先来到此地的于心华教授的介绍，成汉昌教授像迎接老朋友一样接待了我，并就将来彼此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作了很多探讨。那时候如果要去中国，需要经过很多繁琐的手续。认为以后最紧要的问题是韩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如何才能比较容易经常访问中国。我自己也想常去中国，热切盼望和中国的学者交换意见，并去很多地区探访考察。

1990年6月，我带领高丽大学史学会的14名会员，到北京大学参加历史系学术讲座之后，首次探访了中国的东北和江南地区的歷史遗迹。在1991年1月，我带领东洋史学会的50名会员参加了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由高丽大学和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东洋史学会冬季研讨讨论会。会后，与会韩国的中国史专家们50名按自己的专业分成三路前往各地探访史迹十日，最终在上海再会集为一团，经由香港回韩国了。这次研讨会是韩国历史学界的第一次中韩学术会议，同时为中韩两国人文学交流之最初的

2 序 文

学术大会了。我把此研讨会的学术成果编辑成《中国史研究的成果与展望》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91年6月出版发行。我要求在书名前加上“韩国”二字，但由于当时中韩尚未建交，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担心这样做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而使书不能顺利出版，婉拒了我的这一提议。

我又先后于1991年7月与高丽大学专攻中国史的19名研究生，1992年1月与东洋史学系的24名学生一起，两次访问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聆听了北大历史系教授的学术讲座，并前往中国各地探访古迹。两次讨论会的成果，在1992年12月由高丽大学出版部出版发行，书名为《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同时，为了扩大韩中之间的学术交流，我积极推动实施高丽大学与中国方面的学术交流项目，邀请中国的历史学者到高丽大学来，做为期一学期的客座教授。1991年9月，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张传玺教授来到了高丽大学东洋史学系，开始了为期一个学期的讲学。这一交流计划一直持续到我退休的2010年为止，这18年间，共聘请了36名中国学者来高丽大学做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我又激励高大历史系正在撰写有关中国学论文的研究生，到中国的各大学去留学一至二年。这样一来始步入了正轨，和中国大陆长期断交而形成的“学术交流的渴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我获得了韩国教育部的“大学教授海外派遣”的支援，于1993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做了一年的研究。在此期间，我参加了8月在西安举行的第五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结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些学者。回到北京后，我不时进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学研究中心，同周绍泉、栾成显、陈柯云等几位老师进行交流。1993年10

月，接受了徽学研究中心有关先生的热情邀请，我参加了“全国徽学学术讨论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我得以有机会去徽州各县探访，那些仿佛凝固了明清时代原貌的徽州乡村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久久不能散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聚族而居”的村落中，宗祠随处可见，数量众多，这充分证明了徽州的宗族制在明清时代非常发达的这一史实。可以想见，当中国步入近代前夕，发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时代，以血缘为中心的宗族势力，反而被强化了。看到这一情景，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朝鲜时代的集姓村落和亲族组织。有关我的第一次探访徽州的情形，请参见本书第三部《徽州纪行》。

“全国徽学学术讨论会”结束后，去合肥的途中，我和大家分开，在芜湖下车，全为了见安徽师大的唐力行教授。我和唐教授曾在几天前的徽学学术讨论会上初次见了面，对彼此关心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资料交换了意见。他听闻我想要去安徽师大，就帮我预订了安徽师大专家楼的房子，还特意来火车站接我。在黄山市，我曾向唐教授请教有关明清时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资料的问题，特别表示了对民间诉讼问题的兴趣。唐教授带来给我看的史料是族谱的一部分。族谱的正式名称是《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唐教授复印的部分是其中的第十八卷《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这本纪事是方氏一族和其他宗族之间关于祠产纠纷而展开的诉讼过程的简略纪录。但是此时的我根本不知道，以后我会研究《方氏会宗统谱》，并成为本书的作者。

回到北京以后，我读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著名学者李文治教授有关明清宗族制的长篇论文，该文的结论是：“在封建社会后期，持续数千年的封建宗法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反抗斗争的冲击下，有弱化的趋势。”李文治

4 序 文

教授认为中国宗族制在明清时代就走上衰退的道路这一结论，和我在徽州了解到的情况完全相反。而且李文治教授对于宗族制强化的许多现象，认为只不过是“地主阶级为了维持宗族制，拼命宣扬和鼓吹的结果”，实际上是宗族制衰退的表现。对于宗族制，李文治教授似乎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作者也不知道该如何把他的说明整合起来理解。这好像一篇留下的作业，经常在我的脑海中徘徊。

在 1993 年的“全国徽学学术讨论会”上，历史研究所的陈柯云教授曾发表论文，主张“明中叶以后，徽州宗族对乡村的统治逐步加强，到清前期，达到鼎盛。太平天国之后，宗族的统治有所削弱，但余威仍不可忽视”。在我看来，宗族制的形式和发展程度可能随着地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展开地域研究十分必要。而且，认定明清时期宗族制不但未有衰落，反而得到加强的事实，必须有具体的事例，对此，我十分期待。同时，所谓与历史潮流相逆的宗族制强化运动对于中国历史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我关心的问题。一方面，我认为韩国宗族制的发展与中国的宗族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同时，我认为，在从事研究时，不仅要依靠地方志或文集等文献资料，更需要通过族谱或文书资料等作微观分析。

有鉴于此，我以歙县柳山方氏这一宗族作为分析的对象，利用了方氏族谱、地方志和徽州文书来研究徽州的宗族制度。我相信，以微观的方法来分析事例，得出结论，然后再对照一般性的看法，会使认识比较完整。有关本书的第一篇论文《徽州文书和徽州学研究》，就是一篇导论，作者回顾了以往研究成果。本书也进行了史料分析，收入本书第二部分的《方氏会宗统谱》中的《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方氏会宗族谱》卷十八），是非常重

要的史料，也是作者进行研究的核心史料。它明显地体现出了中国族谱的特色，所以作者作了必要的译注，谨供参考。

1978 年到 1981 年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学习的时，曾听过田中正俊教授说：“以后族谱会成为研究中国史非常有用的史料。”那时候只是随便听了，也没太在意。十余年后，突然发现自己也开始以族谱为主要史料，着手研究中国社会史。当时，我住在北京大学北招待所阅读方氏族谱的时候，曾多次把资料卷起来扔掉，又重新捡回来展开，再次阅读的经历。不由得回想起在东京大学的时候，田中教授逐字逐句地分析史料，认真地教诲我们的情景。而作者对自己家谱也只是随便翻翻，并没有仔细看过，想起这些，我自己也不禁苦笑起来。

经过三年的研究，我发表了《明代徽州宗族组织扩大的契机——以歙县柳山方氏为中心》一文，并在韩国的明清史学会和重庆召开的第六届中国社会史学会上作了报告，这是我有关徽州宗族制度研究的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是：歙县的方氏一族供奉先祖方储的祠堂——真应庙及其周围的土地被当地有势力的他族侵夺，面对这种情况，有着不同始迁祖的方氏一族各派联合起来，共同追溯东汉人方储作为新的始祖，统合成一个共同的宗族组织来应对危机。方氏经过宗族结合，从而扩大了宗族组织，形成了柳山方氏一族。我发现，引发这类纷争的实际原因是徽州地区的人口大量增加，但其特征却是以宗族为单位来解决纷争。

1996 年 7 月，时隔三年后，我再次造访徽州。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探访柳山方氏始祖方储的祠堂——真应庙。遗憾的是，真应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完全拆毁，原址上重新建起了四座民房。有关这次访问的纪行收入了本书第三部的《探访歙县柳

6 序 文

亭山真应庙——再访徽州》上。在进行史料分析的时候，我开始产生了真应庙最初并非方氏一族专有祠堂的想法。换句话说，就是真应庙原来是作为乡村的专祠而建造的，北宋时代方氏将它移建后，才转化为了方氏专有的宗祠，明末清初时它又被提升为了统宗祠。“专祠向宗祠转化”是指地方上为了纪念某个名人的而设立的乡村祠堂转变成了特定的宗族祠堂。比如在关氏宗族占多数的乡村里，为尊崇三国时代的关羽而建立关帝庙很可能就会蜕变成为关氏宗族专有的宗祠，我把这种情形定义为“宗祠转化”。地缘性的祠堂转变为血缘性的祠堂，可以看做是宗族制在乡村得到强化的标志。对于宗祠转化问题，在我的第二篇论文《徽州真应庙的宗祠转化和宗族组织——以歙县柳山方氏为中心》中进行专门的讨论。这篇论文曾于1997年8月在长春召开的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报告。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在浙江省淳安县有两座和歙县柳亭山的真应庙名字相同的祠堂，而且还有好几座被称为“仙翁庙”的祠堂，同是祭祀方储。浙江省淳安县和安徽省歙县是邻县，北宋以前柳山方氏12派都在淳安县，从北宋开始一直到明初，方氏才不断向歙县迁移。为此，我撰写了第三篇论文《仙翁庙考——以淳安县方储庙的宗祠转化为中心》。这篇论文曾于1998年在苏州大学召开的第七届中国社会史学会讨论会上报告，这也就是本书的第三篇。

为了撰写这篇论文，亲访淳安县十分必要。正好“第二届韩国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预定1997年10月在杭州大学召开，资助这次大会的是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我的老师金俊烨先生提议我参加此大会，为我提供了一个考察淳安县的好机会。这次大会为期两天一夜，并安排在千岛湖游览。淳安县的千岛湖镇一